



张隆溪 著

走出文化的
封闭圈



RAZI 8/09

张隆溪 著



走出文化的 封闭圈



20028467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出文化的封闭圈/张隆溪著. —北京:生活·读书·
新知三联书店, 2004. 10

ISBN 7-108-02150-1

I. 走… II. 张… III. 文化学-研究 IV. G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9405 号

责任编辑 孙晓林

封面设计 罗 洪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9.5

字 数 210 千字

印 数 0,001 - 5,000 册

定 价 19.80 元

张隆溪，四川成都人。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，为“文革”后第一批研究生。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。1983年赴美留学，1989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。同年受聘于加州大学河滨校区，任比较文学教授。1998年起，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兼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。研究范围包括英国文学、中国古典文学、中西比较文学、文学理论及跨文化研究。

主要著作有：《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》(三联书店，1986)，*The Tao and the Logos. Literary Hermeneutics, East and West*(Durham: Duke University Press, 1992)，韩文译本1997，中文译本1998，*Mighty Opposites.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*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8)，*Allegoresis.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, East and West*(Ithaca, NY: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, 2005)。

KAZ/8/09

走出文化的封闭圈

张隆溪 著

我们能够超越民族主义吗？

王涛 著

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

——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

胡治洪 著

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

柴文华 著

明清小说补论

刘敬圻 著

宋金戏剧史稿

薛瑞兆 著

唐代文学散论

张安祖 著

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

张国刚 主编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刊行

新版序

现在呈献给读者这本书，最初由香港商务印书馆用繁体字排印，2000年夏天在香港出版。书中收集了我过去用中文发表的一些文章，而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，则有赖于我的老朋友，香港商务总编辑陈万雄博士善意的催促。这本港版的书没有在国内发行，我一直觉得有点遗憾，因为我认为本书内容，内地的读者也许会感兴趣，而恰好在内地却见不到。现在三联书店用简体字重排此书，终于了却我的心愿，可以把这些文字奉献给国内的读者。这个简体字版在原来的篇幅之外，又增加了两篇新近完成的文章，分别讨论杨绛先生的《我们仨》和钱锺书先生的英文著作，现在作为最后两章收进此书。此外，我利用这次重排的机会整理原书，在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小的修改，所以这本书和港版原书有些区别，算得是新版。

有关本书各章的内容和全书的大概轮廓，我在导言里已经说明了，这里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。80年代初我曾在《读书》上发表一系列评介20世纪西方文论的文章，1986年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，书名为《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》，收在“读书

文丛”里。这些年来有不少朋友，包括许多初次见面的朋友，都对我提起过那本小书，说当时曾有一定影响。不过许多朋友称赞我那本旧作，也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，对后来较少见到我写的文章表示惋惜。我近十多年来虽然也陆续写过一些文章发表，但因为生活在国外，用英文写得比用中文多，目前这本拙作算是八六年那本小书之后另一次结集出书。我希望今后能作更大努力，对国内的读者有更多一点奉献。

这次整理书稿，得到香港城市大学张万民、陈学然和蔡维玉三位同学很多帮助，也在此一并表示由衷感谢。

2003年9月20日

序于香港九龙瑰丽新村

导 言

这本书收集的文章，大多数都曾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。但我在结集时对每篇都略作修改，使本来独自成篇的东西放在一起，互相能有一点连贯和照应。书的内容涉及许多方面，有些是讨论传统、现代与后现代问题，还有的是缅怀曾给我极大影响的两位学界前辈，即朱光潜先生和钱锺书先生，而能够把各篇文章连贯起来的主题，则是希望打破狭隘界定的各种分野，以尽可能开阔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生活和世界。钱锺书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说，“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，我们为方便起见，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，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，此外没有办法。所以，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，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，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”。〔1〕我所敬重的学界前辈，就都具有开阔的眼光和胸怀，绝不以做某一学问的专家为满足，而总是超越学科、语言、文化和传统的局限，由精深而至于博大，由

〔1〕 钱锺书，“诗可以怨”，《七缀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），113页。

专门家而至于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谓通人。我借用本书一章的篇目，以《走出文化的封闭圈》为全书标题，正是希望能突出这种不受任何范围局限或束缚的精神，使自己的视野能够尽量开阔，由一己的局限而向往于学术之无穷。我在朱光潜和钱锺书两位先生那里见到的，正是这种超越文化封闭圈的精神，也正是这种精神使我在思考传统与现代以及后现代问题时，力求有自己的见解和立场，不赶时髦，不随声附和，更不把东西方文化作简单的对立。

文化相对主义与西方的东亚研究

当代学术的发展，一方面确实把专门学科愈分愈细，另一方面又逐渐有分而复合的趋势，即跨学科或科际整合研究的出现。然而人文学科虽也提倡跨学科研究，但在涉及东西方文学或文化时，很多人好像以为语言和文化的鸿沟无法跨越，所以他们不大愿意承认在文化差异之外或之上，有什么共同或带普遍性的东西存在。一些西方学者对东方和东方文化，总是带着欣赏异国情调、品尝异国风味的心理，视东西文化为南辕北辙，互不相交，甚至使文化差异成为非此即彼的对立。这种猎奇心理往往造成东西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的障碍。在科学技术方面，由于有比较实际甚至客观的标准，有大多数研究者达到的共识，这种文化相对论不可能发生太大影响。例如在数学、物理或生物学等领域，就很少人会主张因研究者或研究对象文化背景的不同，在研究方法或结论上会相应产生根本的差异，也没有人会提出西方的物理学和中国的物理学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。即使有人提出这样的理论，

大概也很难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行家认可。然而人文学科的情形却两样，说物理之同天下皆然，大概不会有这么多人提出异议，但说到心理人情普天皆同，就有不少人会反对。人文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在各种论述之间，不会有如自然科学那样较严格的验证方法和较明确固定的结论，有关文化背景本身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，于是文化相对论在各个研究领域都产生极大影响，强调文化差异也就有可能走到极端，乃至否认任何普遍价值观念的存在。

在西方汉学和整个亚洲研究中，文化相对主义可以说在当前占有主导地位。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出版的会刊《亚洲研究学报》，就曾在90年代初刊登文章，专门讨论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问题。当时的《学报》主编巴克（David D. Buck）在引言中说得很明确，文化相对主义是美国大多数亚洲研究者所抱的信念，他们怀疑在不同语言文化之间“存在任何概念上的工具，可以用不同人都能接受的方式理解和解释人之行为和意义”。〔2〕由此可见，认为人们都生活在语言的牢房里，不可能超越各自语言文化的局限，这类观念在当代西方有极大影响。在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影响之下，文化论述往往表现为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悖论，因为这种论述一方面坚持认为，不同文化的人不可能具有任何普遍性，而另一方面，否认普遍性又恰好成为当前最具普遍性的看法。这样一来，汉学家们往往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与西方文化之差异，使汉学成为西方学界一个很特别的角落，非专门研究者不能入，也不

〔2〕 David D. Buck, "Editor's Introduction to Forum on Universalism and Relativism in Asian Studies", *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 50 (Feb. 1991) : 31.

想人，于是这个领域与其他方面的文化研究隔得很远，也没有什么关联。汉学研究变成汉学家们自己关起门来说话的一个小圈子。我所谓“文化的封闭圈”，首先就是指这样一种情形。

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

然而过度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，把不同文化对立和封闭起来，又绝不仅止于一些西方学者和汉学家在研究中的倾向。近年以来，许多中国学者谈到东西方文化，也往往强调二者的根本差异，而且用对立观念来概括两方面的本质特征。这也难怪，因为任何事物总是要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，才得以彰显自身的特性。不少人为了突出自己文化传统的特点，便往往把这些特点夸大，似乎凡我之所有，则必为彼之所无。就连一些值得我们敬重的学者，也往往在这方面言过其实，做些大而无当的结论，好像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整个中国文化的本质，再一句话就足以归纳西方文化的特点。在20世纪初关于东西文化异同与优劣的辩论中，尽管各方意见和结论往往不同，但在把东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这一倾向上，却有很多共同点。例如陈独秀曾提出“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，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”，由此引出一系列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对立差异。^{〔3〕}与陈独秀论战的杜亚泉也认为，东西方文明“乃性质之异，而非程度之差”，西方为“动的文明”，所以西方社会以“战争为常态，和平其变

〔3〕 陈独秀，“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”，陈崧编《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》（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5），12页。

态”，东方则为“静的文明”，所以中国社会乃是“和平其常态，战争其变态”。〔4〕与杜亚泉观点相左的李大钊也说：“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，即东洋文明主静，西洋文明主动。”不仅如此，李大钊还进一步把东西差异系于南北分野，认为“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，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”，这一点颇值得我们注意。他排列出东西即南北文明的对立特征，认为“一为自然的，一为人造的；一为安息的，一为战争的；一为消极的，一为积极的；一为依赖的，一为独立的；一为苟安的，一为突进的；一为因袭的，一为创造的；一为保守的，一为进步的；一为直觉的，一为理智的；一为空想的，一为体验的；一为艺术的，一为科学的；一为精神的，一为物质的；一为灵的，一为肉的；一为向天的，一为立地的；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，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”。〔5〕这类概括当然不是全无道理，但把东西南北文明特性作如此整齐的排列对比，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它有多么真实可靠。

其实中国古代早已有南宗北派之分，不仅佛教禅宗如此，论人、论画也如此。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：“把‘南’、‘北’两个地域和两种思想方法或学风联系，早已见于六朝，唐代禅宗区别南、北，恰恰符合或沿承了六朝古说。事实上，《礼记·中庸》说‘南方之强’省事宁人，‘不报无道’，不同于‘北方之强’好勇斗狠，‘死而不厌’，也就是把退敛和肆纵分别为‘南’和‘北’的特征。”〔6〕中国古代以为南方人省事宁人，北方人

〔4〕 伦父（杜亚泉），“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”，同上书，17、20页。

〔5〕 李大钊，“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”，同上书，57页。

〔6〕 钱锺书，“中国诗与中国画”，《七缀集》，9页。

好勇斗狠，不正好吻合陈独秀等人所谓“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，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”的话么？由此我们不禁怀疑，所谓东方为“静的文明”，西方为“动的文明”云云，是否不过把古代用于中国南北地域的区分，挪用到现代来区分东西方文化？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问，这种按南北东西地理之别来截然划分文化性格，究竟有多少事实依据？把古之南北牵合于今之东西，究竟合不合情理？最后我们还要问，画地为牢，把自己封闭在“南道文明”或“静的文明”之中，对我们自己、对中国文化又有什么好处？

在五四前后有关东西文化的辩论中，并不是没有人认识到这种文化对立论的局限。常乃惠曾就历史的角度阐明，文化从来是多元的，“没有一个时代是二元对峙的文明”，更“没有一个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对抗的时期”。〔7〕西方文明经过了由中古到近代的发展，由第二期进入第三期，将来的文明不一定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模式，但“文明的趋势只有从第二期到第三期进行，没有从第三期倒退着往第二期走的道理。我们不满意第三期的文明，应当往前找出一个第四期，不能带着第三期向相反方面走”。〔8〕不过这类尊重现代文明、相信理性和进步观念的看法，终究不如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东方文化优越论对国人更有吸引力，影响更大。此时讲东方文化优越者，已不同于清末民初遗老之抱残守阙，而往往能在不同程度上了解西方社会的弊病，所以论述起来更显得理直气壮，振振有词。他们

〔7〕 常乃惠，“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”，陈崧编《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》，271、272页。

〔8〕 同上书，274页。

所讲已经不是“保存国粹”，而是要把传统中国文化作为济世良方提供给全世界，以补救西方文明的阙失。这类理论自然要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，才能以东方文化所独具之价值去填补西方的缺陷，所以文化对立论是其显著的特点。

“东方文化优越论”的陷阱

在这方面最负盛名者，无疑要数梁漱溟 1921 年发表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一书。梁著开门见山，认为当时众人奢谈东西文化，但“实在不晓得东西文化是何物，仅仅顺口去说罢了”。言下之意似乎只有梁漱溟独能在众人之上，深切了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精义，而且能为国人指点一条不同的路径。他认为那时由于杜威、罗素、梁启超等人的影响，“大家都传染了一个意思，觉得东西文化一定会要调和的，而所期望的未来文化就是东西文化调和的产物”。在梁漱溟看来，这种调和的主张“只能算是迷离含混的希望，而非明白确切的论断”。〔9〕他反对调和，认为文化只能走一条路径。他把世界文化大致分为西方、中国和印度三种不同路向，认为到 20 世纪初，西方文化已经衰微，西方的路已走不通了，现在就连西洋人也在改变人生态度，而他们“要求趋向之所指就是中国的路，孔家的路”。于是他宣告说：“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。”〔10〕此论一出，自然引起轰动，虽然在以后数十年间，中国和西方都发生

〔9〕 梁漱溟，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《梁漱溟全集》第一卷（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，1989），331、342 页。

〔10〕 同上书，504、525 页。

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，到现在似乎还看不出西方人立即要走“中国的路，孔家的路”，但那以中国文化为世界未来文化的预言，却的确能增强民族自豪感，对国人有极大的振奋作用。梁漱溟在20世纪20年代作出这番预言，到90年代更引起不少中国学者颇为热烈的响应。他们认为20世纪走到尽头，西方文明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，诸如环境污染、生态平衡破坏、物种灭绝、人口爆炸、新疾病丛生等等，都是西方文化主动不主静、重分析不重综合、以人为征服自然造成的恶果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人类前途岌岌可危，只有中国传统即东方文化历来提倡的“天人合一”，庶几可以对症下药，拯救濒于灭绝的自然和人类。^{〔11〕}

这种理论不仅可以满足中国人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，而且也与当前西方文化理论的主流不谋而合。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有极强的自我批判精神，从哲学、历史和社会各方面深刻反省近代西方传统的基本观念。从德里达（Jacques Derrida）的解构论到赛义德（Edward Said）对“东方主义”的批判，从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到女权主义对所谓“阳具中心主义”（phallogentrism）的颠覆，从质疑西方经典到男性和女性同性恋研究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理论，我们的确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主流是激进而非保守，是以边缘为中心的。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和反对欧洲中心论，正是西方文化本身产生出来的文化批判理论，同时也揭示出西方文化深刻的内在危机。在西方社会环境中，这类理论无疑有激进的意义，不

〔11〕 参见季羨林、张光璜编选的上下两册《东西文化议论集》（北京：经济日报出版社，1997）。

过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，在中国具体的社会环境里，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意义又如何呢？西方理论家们在对西方传统作自我批判的同时，往往把中国或东方浪漫化、理想化，强调东西文化的差异和对立，把中国视为西方的反面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应该首先清点一下自己的家当，看看自己家里还缺些什么，以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取舍，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东西方文化？还是该趁此机会强调自己传统的独特无比，以东方的他者自居，甚至打扮成一副东方玄秘智者的模样，甘为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充当理想的对立面呢？

在我自己，那答案是不言而喻的。我不能赞同文化相对主义，反对东西文化的对立，可以说有两方面的原因，一方面和自己生存的环境和经历有关，另一方面则和自己的思想认识有关。我中学毕业，刚好遇上文化大革命，那十年的封闭和压抑使我反感一切画地为牢、夜郎自大、唯我独左的姿态。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已经濒于崩溃，却终日宣称“形势大好，愈来愈好”，并自诩为世界革命中心，要去“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”。生活现实和政治宣传之间明显的差距使很多人在当时已经满怀疑虑，文革后的改革开放，更使我们明白原来世界是如此之大，而我们被禁锢在高压封闭圈里，对世事了解得又是如此之少。文革中抄家、焚书、“破四旧”，把人类过去的一切文化斥为封资修毒草而铲除，其结果只是使我们自己变得可怕地贫乏。这种经历使我对狭隘民族主义和否定任何文化的虚无主义，产生了永久的免疫力。就是在文革极左的年代里，对那种近乎疯狂的民族自我中心论和文化虚无主义，我也曾由怀疑而生反感，对中外文学和文化从没有失去兴趣。经过了文革，我更不可能把自己局限在任何文化的封闭圈里，不可能把

东西文化机械对立起来，为了弘扬自己的文化就贬低甚至否定其他文化。1978年我从四川来到北京，我们当时是北大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。在吸取知识方面，我们好像在久渴之后可以开怀畅饮，所以无论对哪方面知识，只要与文学和文化有关，就都有无穷的兴趣。我在北大不仅跟杨周翰先生学习17世纪英国文学和莎士比亚，而且常常向朱光潜先生请教美学和文艺理论问题，谈论中国传统诗歌与西方文艺之间的契阔同异。我自己在西语系，但和中文系几位研究生也成为朋友，常常和他们来往。正是在这时候，我有幸认识了钱锺书先生。钱先生著作广采古今东西各种典籍，旁征博引，左右逢源，他的谈话和书信也处处显出极为渊博的学问，给我极大启发。他做学问的方法，用钱先生自己在《谈艺录》序里的话来归纳，就是“颇采‘二西’之书，以供三隅之反”。钱先生的眼光和胸怀，他令人惊叹的学识，还有他自由驰骋的思想，都无不体现超越一切局限、冲破一切封闭圈的精神。相形之下，在思想学术上各执一隅之见、党同而伐异者，就显得多么狭隘和浅薄！我们要走出文化的封闭圈，深入东西文化传统去吸取一切有益的知识，钱锺书先生的著作作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典范。

冲破封闭的心态

在中国古代典籍中，也许《庄子·秋水》的一段话最能写出超越狭隘局限的开阔眼光。“秋水时至，百川灌河”，于是河伯“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”。然而当他顺流而东，见到大海的时候，便不禁望洋兴叹，醒悟到自己原来见识太少，难免要“见笑于大方之家”。海神给他讲了一番道理，要他懂得自知